

# 瞿秋白的新闻生涯

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，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报人生涯。他青春年华的精力、智慧、才气，都无私地奉献于此，这些报刊是他绚丽灿烂人生的最具典型的实证。

## 《新社会》和《人道》

1919年11月1日，瞿秋白等编辑的《新社会》正式面世，那年，他只有21岁。

他在《新社会》上发表了许多文章，如《革新的时机到了》《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》《中国的劳动问题？世界的劳动问题？》《知识是脏物》《自杀》《小小一个问题——妇女解放问题》《社会运动的牺牲者》《社会与罪恶》等等。

这些文章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，鼓吹“实现真正的民主、民治、民本的国家或世界”。他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凄苦生活现状，寄予了深切的怜悯之情，并欲为他们找寻一条自新之路，而为达此目的，“非创造新的信仰、新的人生观，改革旧制度，打破旧习惯不可。”

多年后，他回忆说：“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，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，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……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、瞿世英、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《新社会》杂志的时候，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。”在编辑《新社会》17、18、19号时，他才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憧憬，并较为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，明确地指出，改造社会必须实行“激烈的改革运动——革命——根本的改造。”

《新社会》以全新的风姿，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，传播面可达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。同时，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。1920年5月，仅出版19期，便被迫停刊。8月5日，《新社会》的原班人马又创起《人道》月刊。

在旧中国，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，未免太弱小，太不自量力。反动势力仍视《人道》为异端，因此，《人道》的创刊便成了它的终刊。

## 《晨报》特派记者之路

1920年10月，瞿秋白应聘担任《晨报》特派记者，踏上了风尘仆仆的苏俄之路，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：“灯塔已见，海道虽不平静，拨准船舵，前进！前进！”

在旅途中，他抓紧时间采访、调查，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，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，分别寄给《晨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。1921年1月25日，他到达莫斯科，在《真理报》的帮助下，参观了很多地方。而最令他难忘的是，在苏俄期间，曾有幸见过列宁，并与其当面谈。

他的长篇通讯《共产主义之人间化——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》，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，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，《晨报》在刊用时，竟连载了27期。

两年的时间，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，上自苏俄领袖，下自平民百姓，去过工厂、乡村，调查了苏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民族等各个领域，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。《晨报》以“莫斯科通信”专栏发表了40多篇通信，共有16万字，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，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。

1922年底，他踏上归国的旅程。



《瞿秋白在家乡》（油画）俞云阶作

## 编辑中共中央报刊

回国后，他担任《新青年》季刊和《前锋》的主编，并参与《向导》的编辑工作。1923年6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复刊改为季刊。瞿秋白将其编成“共产国际”专号，封面和刊名都由他设计和题写。时隔半个月，《前锋》创刊，他又撰写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》《中国之资产阶级的的发展》《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》等。他的更多的政论性文章则在《向导》上发表。《民国日报》《东方杂志》等也常有他的文章。

《新青年》和《前锋》，深受党内读者喜爱，他也因此而在全党造就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印象，并为几年后，他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八七会议后，中共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，决定创办《布尔塞维克》，以代替已经停刊的《向导》，由瞿秋白、郑超麟等组成编辑委员会。

当八一南昌起义、湘赣边界起义和朱德、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，《布尔塞维克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。广州起义爆发时，《布尔塞维克》连出三期专刊，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，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。

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和前途，撰写《武装暴动问题》《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》《两个国内战争》和《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》等文章。

1925年1月，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并任中央局宣传委员，负责主编《向导》。

五卅惨案发生后，反帝爱国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。6月4日，《热血日报》正式出版发行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。他题写报头，并请陈独秀撰写发刊词。

《热血日报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，这些文章对于指导五卅运动，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。《热血日报》很有读者群，销售量竟达3万份，以至山东、江西的读者也投书寄稿。6月27日，《热血日报》出至24期后，便被封禁了。

## 编辑的最后两份机关报

半年后，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，担任《红色中华》报社社长和主编。他对《红色中华》最显明的贡献，是培养了一支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，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。

中央红军长征后，他被留守在江西，继续主编《红色中华》，他的部下庄东晓回忆道：“主力北上后，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……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，《红色中华》照样按期出版……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，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，行前，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：‘下去后，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，经常给《红色中华》写稿。’” 来源：人民政协报

## 向警予：中国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



向警予(资料图)

向警予，土家族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及早期领导人之一，女权主义领袖，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妇女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。1895年出生于湖南溆浦，家境殷实，自幼追求新思想新知识，8岁时便成为全县第一个入学的女学生。1912年，她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，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，并将名字改为向警予。向警予在这里认识了蔡畅，并通过她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。

1916年6月，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的向警予，回到家乡担任溆浦县文昌阁县立女校校长，“虽属接办，无异创新”。她打破当时“男尊女卑”的传统观念，倡导“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定”，这句名言如今仍被刻在校园里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生成长。

1919年秋，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、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。同年10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，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。12月，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赴法勤工俭学。她发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，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，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。共同的理想信念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了爱情，1920年他们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了婚礼。

1922年回国后，向警予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，先后出席了党的“二大”至“五大”，当选为党的“二大”、“三大”、“四大”中央委员，并连续担任中央妇女部部长。1925年5月增补为中央局委员。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作家斯诺追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时指出，向警予是“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”。

在革命中，向警予身先士卒，领导和组织了上海闸北丝厂女工和南洋烟厂的大罢工，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。

1925年10月，向警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1927年回国后，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。大革命失败后，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，向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汉，坚持地下斗争。有的同志考虑到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，劝她离开武汉到上海去。向警予说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，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，我一离开，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，这是对敌人的示弱，我决不能离开！

1928年3月20日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向警予不幸被捕。敌人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，但她始终坚贞不屈，严守党的秘密，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。

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她。33岁的向警予一路高呼革命口号，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寒，宪兵慌忙在她的嘴里塞上石头，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，想阻断她的喊声，最后残忍将其杀害。 来源：湖南日报